

范式之争、中国经验与宏观经济理论创新

□陈 璋¹ 万光彩²

(1.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2 2. 安徽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41)

历史重大经济事件都导致了宏观经济理论不同程度的创新,如大萧条与凯恩斯主义革命、滞胀与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反革命等。而苏联范式和新古典自由主义范式阐释中国经济奇迹的无能为力,说明中国经验必将催生宏观经济理论的创新。中国宏观经济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提出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特征的基本假设条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新中国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关键词: 中国经济奇迹; 范式之争; 基本假设条件; 创新与借鉴

中图分类号: F0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656(2008)05—0031—08

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已成为理论界越来越关注的问题,是否有必要提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究竟应当怎样研究和研究什么?它是一门注重实证性研究的学科,还是一门注重规范性研究的学科?出现这些争论既是我国经济理论长期历史演变的反映,更是30年来生动活泼的经济现实和经验的深刻反映。理论演变的历史经验和中国现实的发展已经表明,重大的历史现象和事件必然催生出理论创新,中国经济学创新将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

一、重大经济事件与宏观经济理论创新

宏观经济学是一个持续构建过程的结果,是思想与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从长期的观点来看,任何一个在当时如何流行和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思想,都不过是经济思想史中的一个章节而已。任何理论都只是大胆的猜想,其命运最终都将是被新的经验事实证伪,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应该是在证伪过程中不断得到修正而与新的经验事实并行不悖^[1]。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重大经济事件的发生将引起一场经济理论的创新或“革命”。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演变历史中也可看到,整个20世纪以及刚刚开始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编号:06&ZD010)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研究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编号:07JC790048)、2008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阐释中国价格水平波动——一个基于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视角”的资助。

的灾难),以及正在经历的“中国经济奇迹”。这些大的经济事件及其解释使得原来的思想失去信誉,而由新的思想取而代之。

(一)大萧条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革命

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肇始于大萧条,这个事件在随后的时间中持续不断地影响着经济学家的研究进程。试图寻觅 1929—1933 年世界范围内的产出和就业灾难性崩溃的原因,至今仍是对经济学家才智的激烈挑战^{[2]19}。那些求助于包含在古典经济学及其追随者的著作中的传统智慧的经济学家们,无法为 1/4 的失业率、实际产出 1/3 的下降找到一个逻辑一致的令人信服的答案。建立在萨伊定律、完全信息经济人、竞争性产品市场和劳务市场,以及货币数量论基础上的古典主义,在 1933 年陷入了极大的困境,而 1936 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在理论上宣告了古典经济学在学理上的破产。

(二)“滞胀”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反革命

大萧条在某种程度上为经济思想中的凯恩斯革命开辟了道路,而“滞胀”也为一个货币主义的新古典反革命开启了大门^{[2]3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失业的消除对于凯恩斯思想的传播和影响有深刻的作用,凯恩斯主义非常关注政府在维持充分就业中的责任。为这种思想提供支持的是凯恩斯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菲利普斯曲线,它所表明通胀与失业之间的消长关系为当局的政策选择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菜单”。然而这种以忍受高通胀为代价而换取失业率降低的政策药方,在“滞胀”面前陷入了两难的尴尬境地。在面临政策实践困境的同时,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也遭到了更加致命的打击。

货币主义者通过自然失业率假说,以适应性预期为基础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线中永恒存在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的长期消长关系。这在理论上推翻了作为凯恩斯主义理论基础的重要模型——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在政策实践中动摇了人们对政府的信心。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美国经济衰退中,由于货币主义主要构件的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发生了巨大的波动,使得弗里德曼所宣称的恒定增长的货币政策规则完全失去了可信性。于是以发展弗里德曼——菲尔普斯自然率假说为开端,试图将“通胀与失业之间不存在长期替代关系”的争论加以规范化的卢卡斯,通过将自然率假说和持续市场出清假设以及理性预期假说结合起来,再加上华莱士和萨金特等一些理性预期主义者的努力,掀起了席卷整个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革命”。

这场以“滞胀”为契机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反革命,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以理性预期和市场持续出清为基础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同时一些坚持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学者,在吸取了理性预期假设的基础上,发展了一些具有一致微观基础的一系列模型。这些模型向人们显示了名义总需求的波动是能够影响实际产出的,从而再生了凯恩斯主义,形成了现在的新凯恩斯主义学派。

(三)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的扩散与增长理论的兴起

20 世纪之前,世界经济增长是离散的、不连续的。自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中发生的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变已经非常不均衡地扩散到世界上的其它地方,一些国家经历了非同一般的“经济增长奇迹”,主要集中在东亚;同时一些国家也经历了一些“灾难”,主要是撒哈拉沙漠一带的非洲国家。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学家几乎都认为非洲国家比东亚国家具有更大的增长潜力和发展前景。因此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些新独立的殖民地国家来说,当时正统的经济学理论在解决“如何跳上经济增长的电梯”问题上是不够的^{[2]74}。所以在经济增长领域中旨在建立一个基础理论结构的努力正在向前发展,于是二

战以来,先后掀起了研究经济增长的三次理论浪潮。第一次浪潮集中在哈罗德和多马的强调资本积累在加快经济增长上的重大作用的模型中。20世纪50年代中期,索洛和斯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推动了一个持续更久、规模更大的研究经济增长的第二次理论浪潮。第三次浪潮是因罗默和卢卡斯的研究工作而兴起的,这次浪潮引发了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

(四) 苏东“转型衰退”、中国“经济奇迹”与主流宏观经济理论困境

原苏联和东欧国家按照主流经济学理论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经验,实施了新古典自由主义开出的“休克疗法”药方。但是“休克疗法”的实施并没有出现设计者预期的“U”型经济增长轨迹,而是出现了一种与一般的经济循环不同的“转型衰退”:经济增长率急剧下降,并陷入了一种持久的深度衰退之中,呈现出一种“L”型的增长轨迹,并远远超过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破坏程度。如大萧条中衰退最为严重的美国,实际GDP下降约30%,但在1933年3月之后就开始迅速的恢复,实际GDP到1939年恢复到1929年8月的水平。而苏东等国家的转型衰退,除了波兰以外,其它国家恢复到转型前水平的时间均大于10年,而俄罗斯、保加利亚等国家实际GDP的下降幅度竟然高达50%,乌克兰甚至达到61%,并且甚至至今还未恢复到转型前的水平^{[3][98]}。

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只要产权得到明确界定,市场价格机制能充分发挥作用,经济就能够自动实现增长。对于如何达到这样的初始条件,一些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达成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转型国家需要加速经济自由化进程,加快国有财产私有化进程,使国有财产变成自然人财产和法人财产,弱化国家的经济地位,通过自由化和私有化形成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加快国家的对外开放。但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是,政治上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利用计划、规划等手段调控国民经济;城乡二元经济条件下,资本和劳动要素单向流动等等^[4]。这样的初始条件显然不符合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但中国不仅取得了年均10%的高速经济增长,而且维持持续高增长30年,同时在国际地位、人均收入、城市化率、工业化程度以及预期寿命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果我们将“经济奇迹”定义为超出了现有经济理论的解释力、从已有的经验来看不可能发生而实际上却发生的经济成就,那么中国经济奇迹是当之无愧的。这不仅为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乃至全球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材料,还提出了一系列亟须阐释的重大理论、现实与政策问题。阐释这些事件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成为宏观经济学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任务,中国经济奇迹导致重大宏观经济理论创新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二、中国经济学的“范式”之争

理论界在反思中国和苏东经济实践经验的同时,开始重新检验经济学的基本命题。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这些国家纷纷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而在中国,两种经济学范式的争论却愈演愈热。

(一) 两种经济学范式之争

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首先提出了“范式”概念并用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领域。范式是观察世界和实践科学的方法,是特定学科的一般研究人员所共同掌握的信念、价值、标准、技术手段等等的综合体^[5]。而对于“经济学范式”,《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作了描述性解释,“作为经济学一种范式,最重要恐怕要数边际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主观价值论以及随之而来的边际分析方法。但是很多作者只是从

这个一般方法中选出一部分用以构造其独立的范式”^{[6]852}。我国学者樊纲认为,“范式”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指的是在某一学科内被一批理论家和应用者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共同工具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他在此基础上定义了“主流范式”:在一个国家的某一学科中,代表多数学者所使用的概念和方法,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一个学科所使用的主要理论范式。他把我国1979年之前的主要经济学理论范式称为“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简称为“苏联范式”^{[7]72}。库恩把科学发展分为顺次的:原始时期——范式形成时期——常规发展时期——范式转换时期——新的常规发展时期……当特定科学领域内的一般研究人员在日益增多的“反常”现象面前不再接受原来共同掌握的信念、价值标准、假设和定理时,则是“范式危机”^{[8]32},而这发生库恩所说的常规发展时期和新的常规发展时期,即范式转换时期。

樊纲认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意义,是无国界、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因而不应该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理论^[9]。而中国经济学界改革开放以来所感觉到的理论与现实的冲突,其实主要是苏联版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现实问题的冲突,通过对“苏联范式”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生产资料所有制”、“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与市场经济”、“价值决定”、“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与基本规律”等问题的剖析,樊纲指出了“苏联范式”所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缺陷,因而“苏联范式”处于危机之中^{[7]74}。针对樊纲的这一观点,崔之元认为追求普遍性,并不等于有了普遍性。他通过四个案例指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目前正处于深刻的“范式危机”中:“行为理性”的混乱,微观基础的动摇,“科斯定理”还是“科斯谬误”,以及众多的“不可能定理”。他的结论是:西方经济学的“范式危机”说明目前并无普适的,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基础理论”。因而中国学者不仅要“应用”“基础理论”,更要创造“基础理论”。^[10]吴易风认为樊纲想追求一种具有普遍的、一般的、无阶级性的科学意义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是不现实的。因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这样一种经济学”^{[8]31}。

(二)其它几个有关范式的论点

钱颖一认为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是当代世界范围内唯一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的经济学范式。“现代经济学正是由于有这一被广泛认同和使用的分析框架,才使得经济学相对于其他社会学和政治学发展得更快,应用范围更广,影响更大”^{[11]3}。夏业良通过对《经济研究》近50年,尤其是近20年来发表文章的统计,认为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及代表着过去一个时代的传统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范式都已终结。而现在的主流发展方向应是现代经济学范式^{[12]75}。邹东涛认为中国经济学界存在三大范式,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范式和描述主义的准范式。改革开放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与传统政治经济学是同一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在改革开放以后衰落了,但马克思主义范式并没有衰落,而是挣脱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束缚,走上了复归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在改革实践中创新发展的道路,并结出了丰硕的理论成果。除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和西方经济学范式之外,邹东涛认为中国经济学界还存着一个描述主义的准范式。因为“如果只有上述两个范式的认识,中国经济学界将有为数众多的研究人员及其理论成果无法归类。”但由于该范式并没有完全统一的概念、范畴、体系,折衷的处理方法是将之称为“准”范式。而中国经济学“将是三大范式的共同发展”。^{[13]34}

三、范式之争的启示: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意义是什么?

从上述有关范式的争论中,可以发现一些十分值得注意的基本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所提出的“范式”概念和思想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模式来讲的,并对整个传统科学方法论的认识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如果我们把“范式”概念用于经济学也许首先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第一,“范式”概念和思想的提出究竟是增强了科学理论的客观性(也就是共性)还是增强了其特殊性(个性或历史性)?我们认为,应该是后者,即“范式”思想表明了历史、社会、人们的价值信念对自然科学理论的决定性影响,亦即不同范式并不存在统一的客观基础,是难以比较的。不同的范式是由不同历史因素、社会价值信念等非客观因素决定的,并不具有绝对客观基础。第二,自然科学范式和社会科学范式概念的界定难道是一样吗?显然,由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深刻区别,两类“范式”概念和意义应该是有明显区别的。简单地说,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自然科学的范式相对清晰、有效、易界定,而社会科学范式则模糊、局限、难以界定。决不能把自然科学意义的范式与社会科学意义的范式混为一谈,因此经济学范式具有的共性意义比自然科学范式要小得多,即使属于同一“范式”的国家,其经济运行的整体特征也完全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应该认识到,在经济学中概括不同国家的经济特征、特性和共性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只有共性而没有特性的范式是难以真正成为一个具体国家经济学范式的。实际上,不是经济学中真的只存在所谓“西方经济学范式”或“苏联范式”,而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和自信建立实际上已经存在的“中国经济学范式”。因此,我们学习和借鉴一个范式时,并不意味着要象自然科学范式那样,只能是接受、照搬一个范式,而是应该建立中国经济学范式。

其次,从经济学方法论视角看,如果说经济学“范式”概念的理论意义在于寻找不同国家经济运行规律的共同特征,那么必须要意识到,寻找不同国家经济现象产生的共性原因的意义与自然科学相比要小得多,寻找不同国家经济现象的共性并不是真正社会科学“范式”思想和意义所在。历史主义的“范式”思想实际上告诉我们,任何范式的确立与其历史文化传统、社会背景、人们意识及信念对科学研究的深刻影响有关。简单说就是范式的确立并不存在所谓的客观基础和客观标准。如果说“范式”这个概念和思想对经济学研究有什么深刻意义的话,是它进一步深刻地告诉我们,既然自然科学中范式的客观基础和标准都不存在,那么经济学中范式的客观性(共性)就更难存在。因此,经济学范式也许更多地是反映和描述了一个具体国家经济、一个具体经济发展过程的主要特征。那种企图建立反映和描述大多数国家、甚至反映和描述所谓客观经济规律的“范式”是不可能的。

再次,如果认识到人们对现有经济学(更广义地说是社会科学)范式概念和思想的误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国经济学范式的争论双方会如此对立,甚至到了无法继续讨论的地步。其中的原因有三:第一,任何外来经济学范式在描述和解释一个具体国家经济运行基本特征时,必然存在着相当不能解释的重要部分,即任何国家的经济运行基本特征都必然有其显著的独特性。因而中国经济学的范式只能存在于现实的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而不是存在于已有的“范式”之中。第二,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国家,其30年改革过程和经验的丰富,更是以往的经济学范式所难以概括和解释的。第三,如果我们不是简单的从所谓“苏联范式”或者“西方经济学范式”去看待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经济运行特征,那么就不难发现,实际上这两种“范式”中的某些部分都以某种程度的结合形式,在现实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因此,面对中国30年来深刻的变化和发展,用任何已有的“范式”来解释和描述都是片面的。

最后,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范式”的思想和方法论意义,认识到任何经济学“范式”的局限性和独立性,认识到30年来中国经济发生的极其深刻的变化和影响,就应该从中国改革以来的现实经验,而不是简单地从已有所谓“范式”出发去被动认识和解释鲜活的、生动的中国“经济奇迹”。当然,在寻找中国经

济学范式的过程中,在重视我们的历史经验的同时,也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有科学意义的内容(例如,实证研究的思想和方法可能是我们需要借鉴的重要方面),但更重要的是立足于我们对中国经验的现实感悟优势去思考和研究。只有在充分学习和借鉴有关已有“范式”的基础上,以我为主,以现实的中国经济经验为主,树立走中国特色经济发展道路的研究战略和认识,一心一意关注和研究“中国特色”,才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正确方向,才能解决中国的“范式”问题。

四、中国宏观经济理论创新:若干基本问题思考

实证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是“证伪主义”。实证研究方法的基本程序是:提出理论假设条件——逻辑推理(建立数学模型)——结论并进行经验检验。按照“证伪主义”的思想,实证研究方法最关键的是假设条件的提出,即假设条件正是理论创新的核心内容。按照“范式”思想理解,理论体系的最基本假设条件正是“范式”的核心要件。无论是“证伪主义”还是“历史主义”都表明,任何假设条件的正确性和客观性都是相对的,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一定社会文化、一定价值观、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等多种因素促成的主观认识的反映而已。因此,创新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的核心就是要创新性的归纳和提炼出能够反应中国长期基本特征的假设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正确地提出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一)中国宏观经济学基本假设条件初探

中国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条件既要能简单概括其最基本特征,又要有囊括宏观经济所有主要问题的分析框架,同时还要能够清楚地对比出与西方经济学有关基本假设条件的不同。因此,提出假设条件也是中国宏观经济学创新最困难和关键的问题,需要经过反复地探讨和争论才能够最终形成。下面只是我们的初步设想,希望能“抛砖引玉”。

1. 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假设

我国近代以来的生产力演变过程中,始终强烈地受到发达国家相对发达生产力的影响和示范,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外来生产力引入或冲击的结果,即其生产力演变总体上不是一种“自然演进”,而是一种“强制进化”。在此演变过程中,我国生产力水平结构始终存在质(或“代”)的差别。与发达国家的生产力平衡结构相比,这一假设在现实中表现为,我国生产力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巨大的差距,而在国内存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不平衡状态和不平衡演进。在生产力结构不平衡条件下,西方经济学中所揭示的市场调节整个经济运行机制的有效性将产生它所没有涉及到的不同变化和结果,而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没有分析或难以解释的。

2. “引进式”科学技术进步机制假设

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长期经济增长及生产力平衡结构演变所依赖的技术进步是原发的或自主创新的,可称之为“原发科学技术进步机制”,这与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始终处于世界领先的事实相吻合。由于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与平衡结构之间的生产力总体水平存在巨大差别,因此,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下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只可能主要是引进的方式,即“引进式科学技术进步机制”^①。这种方式与发达国家“原发科学技术进步机制”存在本质的不同:技术进步有明确的方向,从而大大规避了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使投资的风险大大降低,投资的收益更为确定。

^①林毅夫将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科学技术进步方式称为“Innovation”,而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方式称之为“Imitation”,与我们这里的提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3. 国家强控制力机制假设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私有制市场经济仍有着很大的差别。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而主张政府尽量少甚至不干预经济活动。而公有制市场经济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并主张政府在宏观层面上对整个经济进行有效的控制。具体地说,“国家强控制力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有力地保证了社会的长期稳定。(2)通过对土地、自然资源要素供给的国家控制,为经济增长提供廉价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要素。(3)通过实行国有商业银行制度和外汇管制,以指导性信贷计划、利率管制和结售汇制,实施对金融资源供给的控制,为经济增长提供廉价的资金和外汇。(4)通过对教育资源和医疗卫生资源的控制,推行义务教育和相应的医疗卫生体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的身体素质和智力素质较高但相对廉价的人力资源。(5)在其它方面,如经济战略思想、经济政策、大型经济项目建设等的制定和执行的迅速而统一的特征,都充分显示出较强的国家控制力对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力。

(二)有关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

如果我们确认了以上三个基本特征为我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基本假设条件,那么与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相比,其研究对象、内容及方法将发生重大的变化。理论研究的前提(假设)变了,则意味着其研究的对象、内容及方法也将随之发生变化,这正是基本假设条件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所在。

1. 研究对象问题

我们认为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对象,简单地讲就是:关于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基础上经济总量与结构及其关系的问题。与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经济相比,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将呈现出多元化的市场格局。从逻辑上分析,生产力水平高低决定竞争力高低,同一生产力水平范围形成同一竞争市场,不同生产力水平范围属于不同的竞争市场,而不同生产力水平上市场之间的竞争是不平等的,其各自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例如,在我国最简单的市场划分至少可分为农产品市场和工业品市场,农产品与工业产品之间的竞争就是不平等的。因此,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背景下的宏观经济研究对象,必须从西方经济学“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跳出来,突出对国际、国内不平等竞争、不平衡结构发展等基本问题的研究;突出运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政策解决有关不平衡发展问题基本原理的研究;突出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宏观经济不平衡发展中,如何发挥其稳定性和主导性作用及特殊意义等问题的研究。

2. 研究内容问题

在上面基本假设条件下,通过市场机制达到有效配置资源的方式将产生一系列新的宏观经济问题。首先,关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的意义及作用问题。有关研究内容包括:与生产力和市场多元化一致,如何合理布局国有经济体系(多元化体系);国民经济增长与国有经济增长之间的基本关系与结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政策与国有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关系等。其次,关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政策的意义和原则问题。有关研究的一个基本内容是,如何通过国家干预机制有效地解决不同生产力结构之间协调发展的问题。这类问题的基本原则和难点在于,与追求个体最大利益的市场原则不同,必须也只能由国家采取长期、有效的手段、政策,甚至是建立有关制度保证,来尽力提

高或支撑低端生产力(市场)的竞争力水平,促进低端生产力及其庞大人口较顺利地更高生产力(市场)转化。例如,如何把市场调节与国家计划协调起来;如何正确制定国家调控不同生产力水平(不同市场)之间矛盾的有效方法和手段;如何重点解决和保障低端生产力和市场的发展及其巨大就业压力、弱势群体利益等问题。最后,关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和方法问题。由于我国宏观经济问题的性质及内容发生了较大变化,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方法也将随之发生较大变化。与西方经济学强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总量、间接调控手段相比,将有如下重大变化:(1)强调与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平衡发展相一致的结构性调控方法,总量调控方法将更多的被结构调控方法取代。(2)对高端生产力(市场)和低端生产力(市场)的调控问题应采取非常不同的方法和手段。(3)对重大的(与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一致)经济结构问题应采取强制性、计划性手段进行调控等等。

3. 研究方法问题。

西方经济学的有关具体研究方法更适合研究生产力平衡结构(发达的生产力)国家的经济问题,并不完全适合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下国家的经济问题。简单的说,在生产力不平衡结构等条件下,其经济的基本形态是不同生产力水平下的多元市场格局,而不同市场之间的竞争始终存在着不平等、不平衡结构发展的问題,亦即“一般均衡”的假设条件遭到巨大破坏。这样,西方经济学“总量分析方法”的有关假设就完全不成立了,其“加总问题”假设将产生重大偏差,其分析方法的有效性也就大大丧失了。因此,西方宏观经济学“总量分析方法”所依赖的前提条件,与我国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及不同国情条件非常不一致,用所谓“总量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是不适用的、有较大局限性的,必须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为此我们提出,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研究的基本方法应是“不平衡结构分析方法”。

参考文献:

- [1]陈璋.中国宏观经济理论方法论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 [2]布莱恩·斯诺登,霍华德·文.与经济学大师对话—阐释现代宏观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3]陈平.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转型实验中的作用有限[J].经济研究,2006,(10).
- [4]陈璋.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基本特征的方法论视角[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3).
- [5]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6]P. 瓦尔巴赫.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 [7]樊纲.“苏联范式”批判[J].经济研究,1995,(10).
- [8]吴易风.两种“范式”危机论[J].当代经济研究,1996,(2).
- [9]樊纲.经济科学现代化与中国化的再思考[J].中国书评,1995,(5).
- [10]崔之元.西方经济理论的范式危机—与樊纲先生商榷[J].中国书评,1995,(9).
- [11]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2).
- [12]夏业良,王欣.中国理论经济学50年发展轨迹的缩影[J].经济研究,2000,(5).
- [13]邹东涛.讨论中国经济学分化的三大范式[J].经济学动态,2000,(9).

(收稿日期:2008—07—15 责任编辑:蒋南平 张 鹏)